

# 绪论 国际事务中的 货币

“货币创造力多年来已成为国家主权的主要标志之一……  
创造自身的国内货币的能力是主权国家的主要金融特质。”

——Fred Hirsch, 《货币国际化》, 1969

我们应如何看待国际事务中的货币？答案是直截了当的。所有货币都具有国家性质：一国一种货币，美国的货币是美元，英国的货币是英镑，日本的货币是日元，每一种货币在其主权范围内都是排他的。货币地理学主要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进行论述。

作为专业人士，如弗雷德·赫尔希——一位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也持有一国一种货币的观点。经济学家发现很难将货币关系视为超越传统的领土关系外的事情。用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主任的话说：“本质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保持其国家货币和维护其在相应的司法管辖权内的使用视做享有和展现其主权权威的标志。货币犹如一面旗帜，每个国家都得有自己的旗帜”（Mussa, 1995: 98）。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持同样观点：“货币独立超越一切”（Fieleke, 1992: 17）。

事实上，一切事物都不能超越真理，货币使用已不再局限于国家的领土边界之内，而是恰好相反。法国经济学家 Pascal Salin 独具慧眼地写道：“货币的产生，正如法律一样，不再是国家主权的基本标志”（1984: 3）。货币地理学远比我们通常

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种货币已在本国之外作为交换工具而使用——在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或在本国之外的国家之间，前者通常叫做“国际货币使用”或“货币国际化”，后者被描述为“货币替代”，也可称为“国外—国内使用”。更多的货币现在面临国外发行的货币在本国流通而引发的国内竞争。那种否认一国之内可能有几种货币流通的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现象已十分普遍。现在是调整我们的思维应对新的跨境货币竞争的现实的时候了。

国际货币使用和国外—国内货币使用产生于广泛的市场竞争——一种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通过需求力驱动，使得美元和德国马克这样的货币，因为各种商业或金融动机，变得比其他货币更具吸引力。过去，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出现前，货币的跨境流通十分普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市场交换的障碍被逐步消除，这一现象又重新出现，并极大地促进了货币的选择，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竞争和交易者自由选择货币的市场驱动过程正日益发展。结果，个体货币发挥常有功能的领域大大地超越了发行国政府司法管辖权的范围。

民族政府虽然看重主权，但对这一问题也不是毫无兴趣。对于那些负责公共政策的官员来说，货币竞争凸显了明晰的现实危险。货币的产生不再作为国家主权的一个基本标志，但招募军队和征税长期以来被视为国家的根本。真实的权力依存于货币代表的特权。垄断货币发行，限制其他货币流通，操控取得真实资源的多种途径——商品和各种服务，是一种强有力的调动国民经济运行的手段。在一国政府不再对货币创造和管理实施有效控制时，那些优越性就丧失了。一位观察家带着一丝讽刺争论道：“没有控制货币的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任何政府都不愿意是有限的……如果政府要控制货币，他必须垄断货币，如果政府要成为真正的政府，他必须控制货币”

(O'Mahony, 1984: 127).

不管怎样，正在变化的货币地理学已发生作用——政府的权力在弱化，而那些以其名义进行统治的统治者也是一样。当然，政治集团是有所差别的。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充斥着从最民主到最集权的独裁的各种情形。一个政府仅仅可以作为选民的代理人或自身权利的代言人。公共政策可能服务于大多数人或填满极少数人的口袋。政治集团的本质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不管政治集团代表什么，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出现妥协时，个体公民都受到实质性影响。对跨境货币竞争采取漠视的态度对于大街上的人们来说将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本书的目的是重新审视货币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将超越通常意义的金融概念来理解动员储蓄和分配信用的过程和机制，焦点在于以货币进行投资和其他交易的基础性货币供应。我的起始论点是货币在其发行国之外广泛的日渐增长的使用。我的中心论点是国际关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正戏剧性地被日益增多的不同国家的货币在空间上的相互渗透而重新改变形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改变了全球的资源 and 权力分配，它导致了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了潜在威胁。

货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随处可见：从欧洲联盟关于新的统一货币的激烈争论，到前苏联卢布区解体后的悬而未决的后患；从拉丁美洲对“美元化”霸权含义的关心，到亚太地区建立日元集团的急切。美国担心怎样保住美元在全球使用的特权；英国担心怎样保持英镑的自身地位；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共和国寻求建立与其新产生的政治独立相适应的具有良好信誉的新货币；面临通货膨胀的发展中国家正努力保持受到国外货币替代影响的对原货币的信心。每一个政府都必须应对日益增大的依赖他国的风险，而且，政策制定者担心市场难以预测的

压力会加大货币的脆弱性。一丝清新的风正在吹拂传统国界，这将大大改变已建立的全球财富和影响力格局，机会就在眼前。

理论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货币地理学。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中，货币地理学研究受到了严重轻视。实际上，“货币地理学”这个词汇至今不为大家所知，仅有很少学术专家例外。在货币竞争日益增强的世界，那种没有思想的漠视是不可原谅的。

问题很清楚，如果货币区域不再受国界限制，它们的形状是什么样呢？它们如何被确定？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是什么？如果国家货币主权不再得到确保，实践中的货币事务如何管理，就此我们能够或应该做什么？这些问题都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影响。当然一个人不必为了较好地掌握货币地理学而成为地理学家。

## 迈向全新的心理图像

可以对本书的论题进行简单归纳。传统的一国一货币的假说不确切地赋予了政府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体较大的特权，导致全球货币关系中权力结构的错误图像长久存在。现实中，跨境竞争改变了国家在货币管理中的角色，预示着政治经济将出现一个重大的合法性危机。

问题是图像和事实之间的鸿沟还在扩大：我们心中描绘货币地理学的方式——想象景象，构成了我们的货币心理图——货币空间在现实中被构建出来的方式。空间的表达方式被社会性地构造。那种认知的图像起作用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对具体而基础的政治关系的理解——谁有权力 and 怎样实施权力。选择特殊的空间图像会自动地给予特殊形态的控制或权威以合法地位。在陈旧的货币地理学的幻觉上停留使我们很难把握当今世

界货币关系的真正问题。

一国一种货币产生于通常的政治地理的公约中。从 17 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起，政治地理创建了民族—国家，并赋予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的绝对主权，民族—国家是世界政治的最基本单元。正如政治空间被视为由固定的相互排斥的我们称做国家的主体所构成，货币空间逐渐被视为发行国独立的主权范围。在此我称其为货币地理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

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里，民族政府在货币发行和管理方面具有垄断权。结果，货币事务方面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国家手中。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充分利用货币垄断的优势，在国家间寻求合作或分享货币主权的让步是必需的。即使那样，货币管理还是政府的特权。

很久以来，威斯特伐利亚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今天这种理由已不再存在。曾经是现实合理的产物现在已变得过时并变成了讽刺的图画。今天，市场驱动的竞争极大地改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实质上侵蚀了国家的垄断权利。我们需要一个符合潮流的模式，以便形成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更一致的看法。在一个货币更多地在其发行国之外流通且渗透到他国货币空间的时代，我们需要用每种货币的全面的、有效使用和权威进行界定而不是用政治边界界定的图像。货币地理需要在功能上进行重新定义，以便专注于货币交易和货币关系的不断更新的网络。由此看来，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特例，一种严格的领土货币仅仅局限在一国边境内的独一无二的交易网络中。我们需要思考货币构造上可能的、更广阔的空间范围。

在这种新的想象的景象中，权力不仅在国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家与市场力量间重新分配。政府不再自动地享有对其他社会主体的特权，当然，政府继续通过其拥有的货币供应的司法权发挥影响力，但他们在货币管理上的角色已经改

变，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垄断者发展成类似于工业寡头的角色。他们必须与其他市场代理人，特别是作为市场需方的使用者分享权威。货币空间不由政治主权，而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政府与其他社会成员在货币交易网络创建的社会空间中互动。

这种新的管理制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制衡政府权威的独裁行为。国家作为寡头，就不大可能像垄断阶段那样滥用或错误实施货币权力。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普通民众而言，市场主体相比政治家来说更加不可靠，这就产生了决策制定上的合法性和代表性等严重问题。没得到被统治者的正式同意，市场应当起主导作用吗？虽然代表公民的政府并未完全丧失能力，但由于没有准确的心理地图来指导他们，因此，今天的政治家在进行公共政策决策时，不能有效地解决很多问题。

## 探求货币地理学

我探求的货币地理学的意义是如第 1 章描述的社会性构建的“表述的政权”。很明显，传统地理方法很难为当今世界的已实质上非领土化的货币空间概念提供任何指导。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新理论，一种以流动为基础的模式，建立在对物质空间概念和功能空间概念两者清晰的分析性区分之上：“流动空间”取代“位置空间”。对于以流动为基础的模式，至关重要的是货币势力范围的概念，它由国家实施的地域影响和市场产生的交易网络影响两者构成。采用这种新理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实际上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一种常态。

接下来三章的主题是关于那个特例的实质及意义，在第 2 章的前半部分要讨论其历史过程及发展。与普遍的信条相反，一国一种货币的出现实际上是在近代。在 19 世纪期间，肇始于欧洲，之后扩展到其他地区，此时民族政府才开始加强在货

币发行和管理上的垄断控制。在那个历史时刻之前，在政治区域内或区域间多种货币流通的情形，任何人看到时都不会感到吃惊，货币空间被认为有效地超越了地域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在今天再次出现仅仅是过去的重现。

然后我们注意看一看领土货币的主要作用：第一，增进国家认同感的有力的政治象征；第二，公共支出的主要收入来源；第三，调控宏观经济的可能的工具；第四，使民族不受外来影响或限制的一个实用工具。这四大优点都使国家相对于社会成员获取了利益特权。

当然，实际上国家并非总是处在充分利用货币垄断取得完全收益的位置。很多政府不时发现有必要让本国货币从属于其他国家，或与其他国家分享货币主权。前者的各种战略，包括从直接采用外汇或货币到各种形式的钉住汇率，这将在第 3 章进行讨论；后者的各种战略，包括从简单的汇率联盟到完整的多国货币的合并，将在第 4 章进行讨论。对这两种战略，政府做决策时，政治似乎支配了经济。

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替代模式，我们将在余下的四章中分析。第 5 章主要是经验性的，集中数据表明当今世界货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和增长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已公开的和未公开的来源得到的统计数字，给我提供了一个货币的想象景象，它完全不同于对货币空间的常见的认识。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不一样，我们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货币竞争不甚激烈和货币等级差别不太大的世界——不是一个简单地精致划分的领土货币的二维空间，而是一个由市场产生的交易网络形成的客观现实的三维金字塔。以货币的流动为基础的金字塔图像抓住了今日货币地理学的要旨。

货币非领土化对货币关系中的权力和管理意味着什么呢？回到前面分析的货币垄断的四大益处，第 6 章将寻找跨境竞争在国家之间或国家与市场之间对货币事务中资源和能力分配的

影响。某些政府通过牺牲别的政府来取得权力，但私有部门却似乎是最大受益者。通过在替代的交易网络中选择，这些主要的社会行为者将取得一种新的对公共部门决策行为发挥影响的砝码。

然而，权力再分配与解除所有权威是不一样的。第 7 章表明政府在货币事务上并非是过时的东西：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继续控制货币供应。而且，他们的角色已经转变，从有特权的地方垄断者转变为战略寡头，他们有意识地针对市场需方使用者进行竞争。权威并不是简单地被解除，因为非个人的市场力量在被影响中成长。管理存续着，但却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不同，由市场双方共同实施，而不是国家单方进行。这一章总结并归纳了货币空间组织新变化产生的威胁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

最后，在我们对当今货币关系的认识提高后，我提出货币事务的几大政策挑战。论述的问题包括美元的未来、欧洲货币联盟的潜在影响、日元集团的前景以及高度美元化的经济在经济管理上的困难。现实已揭开回归到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前那个阶段的序幕。一定程度的跨境竞争还在，因此政府已无多大选择余地：他们不得不适应国家和社会两者间辩证互动的政策，这种互动正日益改变全球的货币地理学。政策制定者必须学会使自身适应剧变的货币权力和管理的新结构。

# 第 1 章 货币地理学的意义

“形象是一切。”

——Andre Agassi，在为佳能 EOS Rebel 相机所做的电视广告中说。

我们指的货币地理学是什么呢？虽然这个词不常见，但它确实包含了我们讨论的全球货币关系的大多数内容，最起码，“货币地理学”指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货币区域是如何形成和被管制的。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有货币空间如何组织的感性映象，这些映象，或者是心理地图，反过来帮助我们找到通常看待当今世界事务中货币作用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网球明星 Agassi 是对的：形象是一切。问题是近几年货币竞争不断扩大，因此传统的货币地理学的表述显得更为过时，我们需要一种能提高我们认识能力的新模式。

## 地理学的意义

我们从地理学的意义开始。地理学的表述主要是符号——部分地“通过想象构建的空间和人类自身的想象的日常行为” (Shaparro, 1996: 3)。它们是想象的景象，我们使用它们来梳

理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世界模糊而且常常混乱的看法。地理学家谈到地理想象力，它使我们看清可能出现的重大动乱或权力真空的规则甚至动向——“一种看清复杂问题和帮助我们明确我们在哪里的方法”（Massey, 1995: 26）。

这样，地理学的描述已远远超出关于山川、河流、海洋、城市和国家的描述，最起码，它们是对人的描述：我们是谁和我们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正如有人指出：正是地理想象力让我们逐步认清我们所生活的地点在全球的准确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认清了我们是怎样并以什么方式联系在一起，以及在哪个地点。<sup>①</sup>结果，地理学是关于我们所构想的社会的学问：人类地理学。

我们的地理想象力的社会内容日渐被世界政治的学者们了解和欣赏，他们部分地受到诸如 Michael Foucault 和 Jacques Derrida 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远见卓识的激励。<sup>②</sup>后结构主义的基本信息——也叫做“后现代主义”——是决定性的话语力量：一种由语言形成的认识世界的理论。后结构主义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首先在文学研究和人类学方面崭露头角，近期社会科学家也开始强调其重要性，即使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后结构主义的论点，而强调政治关系中对空间的看法。一个学者说：“在社会科学中，货币出现了空间比喻，交谈不断涉及边界、方位、位置、地形、地点—图像和地图制作”（Drainville, 1995: 51）。学者们谈论再想象的政治空间，重新勾画和挑战边界线，想象的景象实际上成为我们怎样思考政治关系的中心。

已被广泛接受的不仅是政治空间描述在发挥作用，而且这些描述正在被社会性地构建——并非神的旨意，而是从我们自身意识和经验上建立起来。John Ruggie 在他的社会认识论中得出这个观点，他把它界定为“人们在想象和识别政治组织形式时获得的心理装备”（1993: 157）。<sup>③</sup>Foucault 在建立在法国

传统观念上的《心理学全书》中指出：“是文化的基本符号……已经符号化的眼睛”（1970：XX-XXI）。其他人谈论模式或范式时，他们的看法基本一样；社会心理学家谈到“认知作图”时，看法也是差不多的。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主要建立在那种心理形象基础之上。

当然，地理想象力必须建立在经验现实上。如果空间描述仍是有用的，他们不可能全是武断的描述。相反，虽然我们可以排除一些过激行为，在替代的社会构建方案中选择，也不可能只找到一个单一的客观真理。地理描述毫无疑问是主观的——更恰当地说，相互主观——每一个看法从一个特别视角出发，以社会互动为基础，表现为多种可能的解释中的一种。没有人能宣称既是绝对中立的也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下，所有不远离被观察事实的看法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如 David Elkins 写道：“社会性地构建的世界……不是自然的或‘给定的’……（它们）应视为可塑的，是环境的组成部分，最终从共享的社会经验中产生”（1995：18-19）。

然而，如果我们要弄明白周围的政治，我们需要做出选择。政治是关于权力和权威的：怎样制定规则并在社会中分配价值，以及怎样实施和强制实施。简言之，怎样管理社会。认识到那些事情涉及利益因素并非一种过激的看法；大多数现有的地理的图像不管是否精心设计，都倾向于反映那些构造这些地理图像的人们的主要影响力，这种认识，并非不公平或幼稚。正如一位观察家提到，那些描述是“社会产品……它们反映了权力均衡”（Massey, 1995：41）。在替代图像中选择，我们不仅让某种对现实的解释超越其他解释，而且构建出一种权力结构超越其他结构——一种管理制度而非其他。我们的选择不带来任何后果，正如 Edward Soja 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一直注意到空间如何能使一切后果在我们身后隐藏起来，权力和规则的关系如何写入社会生活洁白无瑕的空间，人类地理学如何

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 (1989: 6)。

实际上，地理学是政治学。我们怎样构建空间确实将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制定制度和强制施行，怎样把统治权和权威的特殊形式合法化。这个见解被一个合适的词——“表述的政权”充分予以了说明，正如近期评论中讨论的：

权力结构深深留在“表述的政权”记忆中。这些权力结构被置于主体形成过程和空间概念中……同时被置于维系不同生产方式的政治结构中。(Murphy 和 Rojas de Ferro, 1995: 63 – 64)

在把表述的政权和空间概念捆在一起的思想指引下，本书力求探寻货币地理学的意义。为更好地理解货币政治，我们将研究货币的空间组织：深深留下货币关系烙印的管理制度。我们会问货币空间是如何组织的。答案将告诉我们谁有权，并怎样实施货币管理，这对当代政治学 and 经济学有什么影响。

## 货币的意义

接下来思考货币的意义。<sup>④</sup>本质上，货币是按其发挥的功能进行定义的概念。正如很久以前一位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诙谐地指出：“货币是那些主要由使用和服务的目的界定的概念之一，如茶匙或雨伞是货币，地震或金风花则不是” (Hawtrey, 1928: 1)。货币是一切习惯性的或主要的具有某种具体功能的东西，而不管其外形或法律特质如何。

货币有传统的三种特殊功能：交换中介、计量单位、价值储藏。作为交换中介，货币是流通支付手段的同义词。在这一角色中，货币的主要属性在于作为交易媒介的普遍可接受性。作为计量单位，货币为不同商品服务或资产估价提供了一个共同尺度，或计量工具。在这里，货币的主要属性是可靠迅速地传递价格信息。作为价值储藏，货币是方便的财富保留手段，

这种角色的货币属性是其具有维持购买力的能力，并在销售时收入和购买时付出的短暂时期内起到桥梁作用。<sup>⑤</sup>

发行货币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媲美”于“驯服动物，耕种土地，利用动力”（Morgan, 1965: 11）。货币产生前只有物物交换。最原始的经济交易需要以双方相互满意的东西进行交换，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必须知道另一方准备提供什么——一个典型的低效率交易制度，因为许多时间都用于寻找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随着货币的引入，单一的物物交换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交换，卖和买，从而降低了获得信息的成本。为尽快交货，卖者可以接受货币，而非商品或服务，一直持有到需购买时为止，同时用货币判断市场价值。结果是促进了多边交换，促进生产分工和不断增加效率的劳动力分化。

如果没有社会内部最低程度的结合，创立货币将是不可能的。位于某地的几群代理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当前有效的用于支付和计量的工具是可再次使用的。货币的三种角色的核心是信任——相当多的具有共同愿望的交易者的共同信任。任何一个理性的个体都不愿意在没有最低保证时，拿出一个东西交换那些别人不接受的商品或服务。的确，货币除了尽可能增进双方信任外别无意义。

那种共同信心契约从何而来？它可能来自国家行为，正如德国经济学家 George Knapp 在 20 世纪早期所主张的。按照 Knapp 的“国家货币理论”，所有货币都是法律的产品并且其有效性是依法律条例建立。但这是一个实际上过分狭隘的观点，随意地放眼货币历史就一目了然。接受性也可以产生于大量非国家资源——实际上，仅仅是市场实践的缓慢聚积，它全方位地反映了所有的社会信仰和影响。货币中体现的信任根源事实上有很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很神秘，正如经济学家 W.T.Newlyn 所论述的：

对于（货币）起作用的必需条件是清结债务的普遍接受

性。普遍接受性产生于很多因素的单独或共同作用；它（普遍接受性）出现在受自我判断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组令人迷惑而神奇的现象中。如社会成员认为货币具有普遍接受性，它就被普遍接受的，否则就不是。（1962: 2）

一个使社会关系紧密相连，代表那个社会的基本属性的词语是网络。这个概念，不断地被社会科学家用于分析各种层次的行为，从地方的到全球的。网络思想强调不同个体和组织间的基本的互补性和承诺，网络思想也强调协作和自我控制，以完成当前的共同适应过程。在网络中，关系已被分散化，而且相距遥远和非个人化。联系已不受具体位置和需要面对面交流的限制。关系也可以是间断的，包含偶发的和通常简短的相互作用的情形。产生作用的网络既不要求正式的制度设计也不要求详细的规则，而只需要一群人一定程度的互惠和信任。

对于货币，基础是交易网——自主的代理人进行相互交换，他们可以仅有一点共同点或没有共同点，他们可以住在相距遥远的地方。货币交易网络的要点，很多年前被 George Simmel (1900)，甚至更早前被卡尔·马克思论述过，今天被许多学者引用。实际上，对社会学家来说，网络已成为抽象的经济学概念的基本所在。一位早期分析家提出，货币“是一个社会事实”。<sup>⑥</sup>用其他语言表述，货币被理解为以真实历史环境为基础的一种结合和一种不断进化的社会机制——一种市场实践和行为方式带来的自我增强型的产品。用当代社会学家 Nigel Dodd 的话说：

货币交易传递的固有信息提供了货币交换和物物交换两者间最基本的区别。具有意义的是，这种区别不是产生于对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比较，而是产生于对交易的任何一方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检验……接下来，为理解货币的本质特性需要提到使交换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网络。（1994: xxiii）

经济学家也强调交易网络的重要性，特别是当他们解释

币的起源和实际收益时。货币经济分析的核心是交易的成本问题——与寻找、讨价还价、不确定费用、执行合同等相关的支出。货币交换比物物交换的交易成本明显要低，储蓄总量直接与愿意接受该货币作为支付工具的参与者数量有关。关于货币交易网络规模，正如一个分析家所说的，市场的“厚度”(Alogoskoufis, 1993)越大，从其使用中派生出的经济规模就越大。货币理论家把这些收益描述为货币网络外部性、厚度外部性，以及更简单地描述为货币的网络价值。网络外部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相互依赖的形式，在相互依赖中，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行为，在战略上都依赖于在同一网络中互动的其他参与者所采取的行为。

结果，交易网络界定了不同货币的功能领域：实施不同货币目的的有效使用的范围。我们看到，货币地理学基本上根植于这些主要社会结构。

## 政治地理学

货币地理学的心理地图需要在相应的概念或模式中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每一个选择代表了不同的“表述的政权”。正如 Robert Gilpin 提示我们：“不管信仰……货币制度是一个中立机制，每一种货币制度都会产生不同的成本和收益”（1987: 19）。传统的描述基于一国一货币假说，实质性地赋予了国家对个体市场主体更大的利益特权。在一个跨境货币使用日益增多的年代，那种观点已过时了，一种全新模式呼之欲出。

## 领土陷阱

描述货币地理学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基本的领土词汇，即那些传统的政治地理学的同义词。<sup>⑦</sup>正如我们大家受条件限制所看到的世界外表，首先看到的是被称做民族—国家的固定而互

相排斥的主体，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货币是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范围内产生的。政治上，全球被分成了以国家管辖权为基础的领土。为什么不按相同的国家中心方式对货币进行定义呢？

答案是，那样的方法远比其表现出来的更模糊不清——正如政治地理学从地理中产生一样。我们知道的领土，是基于人类的社会权力的基本的地理学表述，它可以追溯到类人猿时期。地理学家 Robert Sack 说：“人类的领土最好理解为通过控制区域去影响或控制资源和人类的一种空间战略”（1986: 1）。<sup>⑧</sup>

然而，近些年，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样开始强调国际关系中常见的领土思维引起的局限和缺陷——具有欺骗性的天真的看法，世界政治被理解为“精致的空间的套件”。<sup>⑨</sup>领土分析法作为勾画政治地图的方法，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歧途。今天，这种方法离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更加遥远，正如 Robert Jackson 写道：

主权国家制度……现在如此植根于人类公共生活和刻留在人类心中，它看起来是超越了国家领导人和其他人控制的一种自然现象。当学生们被不断地带到在各大洲和各大洋上标着具体国家位置的世界政治地图前，他们能轻易联想到那些政治主体具有同样的外部特征，诸如有划定国际边界的山川和河流。毫无疑问，这种地图本身及其所代表的主权管辖情形完全是可以改变或消除的人为政治安排。（1990: 7）

主权国家制度的概念以排他的领土范围为基础，具有历史悠久、可尊敬的血统，至少可追溯到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被普遍地认为是世界政治的分水岭：在大多数人眼里，不仅仅是第一个确立现代国际法的条约，更根本的是它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进化的关键时期的标志。表面上，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为了结束长达

30 年的战争。这一份复杂的文件，包罗了对争议的很多问题的规定，包括不同王室的声明、领土划分、宗教活动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宪法。条约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其承认每个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享有主权的准则。结果它正式地确立了以领土为欧洲政治地图的单一基础。<sup>⑩</sup>这样，权力就被赋予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政府不得干预其他政府的内部事务。

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前的中世纪，事情要复杂得多。在欧洲没有固定排他的主权，权力和权威是散乱的、游动的，当然更有渗透性。政治领地被分散和混合成千疮百孔或相互重叠的形态，而且不完全的政府权利中不同的诉讼判例由于地理位置不同而相互交织和重叠，双重效忠的、不可调和的宗主国关系及不规则地被外国领地包围的土地随处可见（P. 安德森，1974：37-38）。由此形成错综复杂或模糊的合法性，它被接受并作为宇宙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当时，没有人想到领土会作为政治空间组织的决定因素。用 Ruggie 的话说：“中世纪的制度……一种分割领土的制度形式，它绝没有现代主权概念中的所有权与排他性的内涵。这种制度代表一种畸形组织的领土权和领土主张——政治空间上的”（1983：173）。

相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却将领土视为世界政治的核心组织原则。中世纪之后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时期，合法的统治制度呈现出以领土界定的、固定而相互排斥的国家主体的形式，所有功能概念基本相似。<sup>⑪</sup>主权原则上是绝对和不含糊的——一个受相同法则支配的政治空间组织形态，而不是畸形的组织形态。<sup>⑫</sup>领土国家被广泛地认同为政治权威的基本单元，政府对社会拥有更多特权。全球政治被看成熟悉的民族—国家制度——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政治地理学模式。

然而近年来，领土主权国家作为政治现实中准确表述的概念，已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充分审查。<sup>⑬</sup>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是特殊时间和地点的产物。它不能对普遍真理或外部有效性进行解